

深度
浙江新闻名专栏

第117届广交会一期，宁波交易团累计成交额超4.5亿美元，家用电器依然是成交量排名第一的明星产品——

家电“甬军”昨闯广交会

本报记者 余晓辰 通讯员 姚波

从一台洗衣机看中国产业转移向“一带一路”进发

“这是我参加的第三十届广交会上，十五年的岁月，青春不再，激情犹存，感慨之余，尚觉欣慰。”在广州琶洲展馆的特装展厅里，宁波乐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乐建荣忙里得闲，掏出手机在朋友圈写下了当下的心境。

乐建荣下海创业十五年后，一个制造业大国的产业转移路径越发清晰。现在的中国，不免让人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。因为人力、土地、税收等成本的快速上涨，越来越多的密集型加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，其中不乏许多宁波家电企业的身影。

宁波集聚了众多洗衣机生产企业，在市场几近饱和的情况下，剩余产能转移刻不容缓。作为鄞州最大的洗衣机生产商，乐士“走出去”将目光转向“一带一路”。目前，东南亚、中东、北非都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。

相较于直接到国外建厂，乐建荣选择了一条更为稳妥的路径——技术出口。乐士将大批的洗衣机生产模具、配件打包出口，并派驻技术人员到当地进行生产指导。“这样不仅避免了整机出口高昂的关税，巧妙地绕过了贸易壁垒，也规避了直接在外建厂的政治风险、社会风险等。”目前，技术出口形式已经占乐士全部出口额的40%。今年，乐建荣计划打造技术出口互联网平台，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技术服务。

从一只电饭锅看自主品牌“回家”为国内市场“留一手”

在广交会上，我们不仅看到形式新颖的“走出去”，也看到了许多的“回归”。午饭时间已经过去很久，慈溪乐士电器有限公司工程师陈尉匆匆地在展位上扒



本届广交会上，国外客商对宁波家电饶有兴趣。(余晓辰 摄)

了两口便当，赶忙起身接待来访的客商。陈尉说，公司今年推出了全新的家电物联网产品，上午前来咨询的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客商络绎不绝，他忙于接待，很少有时间歇息。

“这只多功能电子锅不仅配有感温器，还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口味偏好设置了不同的食谱，都是请各国的顶级大厨定制的。”陈尉手中的这款多功能电子锅，花了研发团队不少心思。

多年来，欣轮电器一直为欧洲、日本厂家做OEM、ODM，是松下、东芝等日本家电巨头的代工厂。今年，企业将在外贸的基础上推进国内自主品牌建设。“其实，我们的锅不比日本的差。”

陈尉的不服，还需要市场的检验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国内消费者不用再越洋

去买“高端货”了。越来越多的宁波家电出口企业，开始回归国内市场打造自主品牌，为国内消费者“留一手”。

“现在，国内消费者对品质和品牌越来越看重了。”浙江卓力电器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乐玉帮说。今年年初，卓力在国内办了一场盛大的新品发布会，这只进惯了欧美高端百货商场的慈溪电熨斗行业领头羊，正在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。

从一台空调看“互联网+”浪潮都想迎“风”起飞

站在“互联网+”的风口，家电业也想起飞。在今天的广交会上，宁波的智能家电已经摆好了“起飞”的姿态。

在奥克斯的特装展区，一款带有“安

睡宝”功能的儿童空调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空调装载的传感功能，能够在使用者体温变化后自动感知，将室内温度调节到最舒适。

奥克斯空调事业部总裁钱旭峰告诉记者，企业自启动全球大客户战略合作以来，新打开了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台湾等地的市场。今年一季度，奥克斯空调出货量在国内各品牌中排名第一。

“互联网+”，不仅带来智能化的产品，还带来了渠道的虚实融合，以及商业模式的改变。

“下个月，我们将和京东合作，以众筹的方式推出新产品。”钱旭峰透露，奥克斯不仅在产品上融合物联网、智能WIFI等概念，还将深度挖掘电商的新模式。在微信朋友圈进行口碑营销，“用户如果将产品成功推荐给朋友，就能自动获得企业奖励”，这也是奥克斯可能涉猎的营销渠道之一。

延伸阅读

“配角”掘金外贸综合服务

搭载了“互联网+”概念，外贸服务行业也成为竞争激烈、备受瞩目的焦点。在本届广交会宁波团的名单中，出现了几位亮眼的“配角”：世贸通、宁兴云、大道商诚。

“阿里的一达通在行业内扮演了市场培育的角色，现在客户很少再问我们商业模式的问题，而是更关心我们能提供哪些增值服务。”世贸通副总经理孔泽昊表示，在国内行业大佬的强势布局下，本土外贸服务平台应该探索更接地气的本地服务，抓住区域内的客户群。

世贸通的市场定位在长三角。去年，世贸通仅在宁波本部的业务量就达到2.5亿美元，实现了80%的增速，更成功进军无锡、常州、义乌、绍兴等地。下个月，世贸通还将和海南航空合作，抢滩大上海。

(余晓辰)

风险投资正当时

宁波市股权与创投行业协会秘书长 金晖

当下，面对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，风险投资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，正越来越被社会各界重视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。如何乘势而上，以风险投资推动我市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，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议题。

近几年来，宁波的风险投资虽然迎来加速发展的势头，但相对于国内一线城市，仍处于起步阶段，机构整体实力较弱，行业发展水平不高。分析个中原因固然很多，但行业生态体系尚不成熟，创投专业人才缺乏，投融资平台不够健全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要改变这种局面，应多管齐下，从观念创新和互联网思维的角度加以突破：

首先，发展风险投资应当允许试错，改善创业生态链。通常认为，一名天使投资人投10家企业，有可能只有两三家能成功。但如果一家初创型企业或创业者能引入风险投资，可以解决其融资难题，规范企业财务，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等。正因为此，风险投资也被誉为是“天使”投资，成为创业创新的坚强后盾。而对于一个合格的天使投资人而言，不仅要着眼于长期投资带来的收益，也要坚持“快乐投资”的原则，和创业者一道勇于面对失败，带着激情去“追梦”。因此，应当加强对宁波市民和投资人风险投资意识培养，吸收更多的民间投资，培育更多合格投资者，让个人、机构、公共投资都愿意通过风险投资机构将资本投向风险企业，使我市投资者结构呈现多元化，从而扩大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；另一方面，还要引导企业和创业者了解风险投资，积极对接风险投资，通过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实现快速发展。

其次，尽快建立统一的数据库，使项目库与投资人两方面能够有效对接。当前，风险投资已越来越为社会各阶层所重视，一些职能部门和各县(市)区开始力推一批优质的创新创业项目，积极吸引风险机构进入，举办多场资本与项目的对接会。但是，信息不对称仍然是创投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。这就需要协调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，将一批“雪藏”的优质项目能够及时发布到统一的平台上；同时，也可将合格的天使投资人与机构投资者集结起来，集中发布其相关信息，以有利于企业和投资者能顺利“联网”。当前，宁波市股权与创投行业协会和宁波主流媒体合作举办的“寻找宁波创业之星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，这正是使投、被双方有效对接的积极尝试。

此外，可考虑构建全国性的小微企业股权交易所。建议由政府出面，引进战略投资者或民间资本，打造一个小微企业投融资平台，集结全国乃至全球的VC、为宁波乃至全国的小微企业提供股权转让、创业投资、项目落地对接等全方位的增值服务，同时借此机会提升宁波风险投资行业的能级，支持宁波本土的风险投资机构做大做强。

(杨绪忠 整理)

检举揭发咋成了“叛徒”？

□罗浩声

被称为“福建首虎”的福建省原省长徐钢，2012年任泉州市委书记时，曾在老干部座谈会上主动谈及被举报一事。参会者回忆，当时徐很生气，说泉州有“叛徒”举报他，并扬言“如果不是我的身份还在，我就要和你单挑”（4月24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
“叛徒”，本意是指那些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的人。在壁垒分明、斗争残酷、你死我活的年代，谁若是当了“叛徒”，就意味着自绝于人民，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中共党史上，就曾出现过向忠发、张国焘和顾顺章等高级别的叛徒。现如今，多数青年人由于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之中，甚少听到也很难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了。

没想到，随着“福建首虎”徐钢的落马和相关细节的披露，“叛徒”这个词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并引发热议。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叛徒不同，透过徐钢的“叛徒”论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的狂妄和任性、举报者的心酸和无奈，看到的一些腐败官员“斗争经验”之丰富，和其用心之狡诈、险恶、毒辣。尽管自古以来就有“那不屈正”之说，但设身处地为举报者想想：面对身居高位、尚未现形的“大老虎”，面对这么沉重的一个“罪名”，面对如此肆无忌惮的打压、恐吓和挑衅，怎能不“毛骨悚然”？

很显然，像徐钢这样的“老

虎”，敢于在会上公然向举报者“叫板”，并非是“随口说说”。实际上，在他们享有绝对权力和地位之时，根本无须亲自出面“单挑”，只要给那些“忠心耿耿”的嫡系、“善解人意”的下属一个暗示，就足以把举报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稍微年长点的同志，想必还记得郭光允这个名字。据报时，当年这位“反斗星”因举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，也被某些人视作“叛徒”。结果，郭光允在经“专案组”审查后，被开除党籍和劳教两年，其家人亲属近20人先后受到牵连。与他命运相似的，还有沈阳离休老干部周伟，同样也因为举报慕绥新、马向东等沈阳贪官，换来两年劳教。

现实中，除了“老虎”，给举报者颁发“叛徒”帽子的，还有特定群体内的既得利益者。去年轰动一时的中交二勘院内部职工向纪委和媒体自曝单位“送礼清单”事件，就是一例。虽然被举报的涉案人员后来受到了应有的处理，但因这次举报影响了单位和职工利益，举报者亦被同事骂作“叛徒”。有了这顶帽子，举报者在单位里会是什么处境？可想而知。

实事求是反映和检举问题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，也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基础。可有的时候，应用这个权利，也是有风险的。比如徐钢在位时，凭借权势，轻轻松松就给举报者扣上了“叛徒”帽子；就像郭光允和周伟，正常举报却换来了牢狱

之灾。这也说明，那些手握重权的“老虎”，是不甘心坐以待毙的。为捍卫既得利益，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，同正义力量进行殊死抗争。所以，对举报者动辄扣出“叛徒”之类说辞的官员，要保持足够的警惕。

当然，防范举报者沦为“叛徒”，最终还是要靠法规和制度“撑腰”。西方国家对揭露问题的“吹哨人”，有一套严格的法律保障。而我国这方面的立法还有些滞后，类似“秦香莲”的告状信转给“陈世美”的怪象并未绝迹。改变这种状况，必须通过完善法规制度，构建起最安全的举报人保护体系和最严厉的报复者惩处机制。如此，才会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，与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进行坚决斗争。

以减税兑换“企业年金”更务实

□马涤明

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就企业年金问题表示，目前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修订出台《企业年金管理办法》，鼓励更多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制度，进一步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（4月24日《中国保险报》）。

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引发“新不公”质疑，因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年金制度属于国家法定，财政拨款而不存在任何障碍，而企业年金不具强制性。人社部称，到2014年底，建立企业年金单位已有7.3万户，参加职工2200多万人。而这之中有多少民企，国企中高层人员是不是占了数字的大头，并不难想象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民企在年金问题上缺少积极性，确是事实。

现在企业税费负担沉重，特别是中小企业，成本压力非常大。政府如果只是口头“鼓励”，让企业继续增加成本搞年金，无异于“与虎谋皮”。务实的鼓励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减税。去年广州饮食商会的一份数据显示，餐饮业要缴纳的税费高达50项，占营业收入的12.5%。形象的说法是，一只鸡13种税、29种费，一只鸡腿全贡献给了税费。一些经营者表示不得不考虑继续涨价，然

而涨价又会导致消费减少，走向恶性循环。结果是不死于涨价，就死于税负。广州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全国的情况。这个背景下，又要企业深工资，又要“鼓励企业年金”，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显然无力负担。

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实施已两年多，共享改革成果更是讲了很多年，结果是，体制内的“改革”与“共享”总是立竿见影，所有涉及利益分配的改革，不是确保报销比例不降低，就是确保收入水平不下降，而提升企业养老金替代率等能够体现分配公平的举措，依旧遥遥无期。公众所以要求养老老金并轨，绝不是只为了“都缴费”这种形式上的“公平”，而是缩小分配差距的实质性公平。

虽然年金制度可能引发的“新不公”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，但如果仅仅是“多种途径加强宣传引导”“我们一起来呼吁”，而不给政策，只想着让企业主动出钱，恐怕于事无补。只有通过对企业定向减免税，以少征税的方式增强企业财力，或者让企业的职工也享受公共财政的蛋糕补贴社保，才是最公平的办法，也是最可行的路径。



按部就班

何影 绘

没收违法所得需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

□杨涛

四川首例因被告人在诉讼期间死亡，检察机关申请没收其违法所得案件正式宣判。眉山市中院判处没收被告人阿牛某某（已死亡）及丈夫吉额某某账户内150.6万元存款及孳息，对吉额某某账户内20余万元存款及轿车一辆等合法财产予以解除冻结和查封，发还被告人亲属（4月25日中新网）。

没收被告人、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程序，是由2012年修订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所确立的。但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唯有法律规定，没有对一个又一个案件的具体操作，法律不能说得到了实施，也无

法检验法律的成效。四川这一案例的审判具有标本意义，彰显了打击犯罪的决心，犯罪分子、贪官死亡了，不合法财产照样会被没收，加强了刑罚的震慑力，有助于织密法网。

以往，由于没有没收违法所得程序，一些犯罪分子在接受调查时往往抱着“死了我一人，幸福一家人”的想法，或自杀或跳楼，指望以命换财；有的犯罪分子则选择外逃，人安全了，财产也安全了，等有机会再将财产转移好好享受。但有了这一程序，犯罪分子死也不安心，逃跑也不会舒心，因为担惊受怕换来的

赃款仍会化为乌有，这很不划算。

当然，过去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或者纪检机关，也会自行没收犯罪分子违法所得。但这样由办案机关直接没收违法所得问题多多，不符合法治精神。其一，有些地方没收财产很随意，可能将犯罪分子或其家属的合法财产也一并没收，留下不少隐患；其二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，就没有公开性，一些办案人员私自扣留赃款、赃物的现象时有发生，很容易引发司法腐败；其三，没有经过司法程序，不能让犯罪分子或其家属信服，也无法说服社会公众，更不能教育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。

四川的这起案例表明，只有经过公开、透明的司法程序，没收被告人、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才能做到公平、公正，让犯罪分子家属、社会公众信服，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。

法兰克福：宁波空港国际化「标杆」

□陈依元

宁波空港将首次开通欧洲航线，一个多月后直飞罗马和法兰克福，待时机成熟将改为正班（4月25日《宁波日报》）。这一消息令人振奋！

早前，宁波国际航线多为直飞日韩、东南亚。近年随着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，浙东地区前往欧洲的商务、旅游人数大幅增加，以往要去沪、杭登机，很不方便。如今宁波开通欧洲航线，不但利于浙东旅客赴欧，还将进一步夯实宁波空港的国际化地位。众所周知，由于周边机场多，竞争激烈，宁波机场处于“包围”之中。我们如何“突围”？窃以为法兰克福经验可作为学习标杆。

去年，笔者随团赴中东欧旅游，往返德国法兰克福，对其印象深刻。它是德国第五大城市，在城市规模、旅游知名度方面比不上柏林、汉堡；在欧洲，更比不上巴黎、罗马等名城。谁能料到其莱茵-美因国际机场却是欧洲第二大空港，近几年更一跃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国际航班换乘中心。原因何在？在于法兰克福位于欧盟地理中心，密集的航班可以很方便地转机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地；从市中心到机场十分便利，汽车、地铁、火车可直达机场，还开设往来海德堡及曼海姆等地的巴士专线。同时，法兰克福不仅是德国的经济中心、欧洲货币机构汇聚之地，拥有400多家银行，博览会业发达，还是一座文化名城，客流量巨大。许多中国旅客中转欧洲各地，通常会选择法兰克福。

宁波与法兰克福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。宁波地处中国海岸地理中心点；有世界级大港作为依托，已成为区域海陆交通枢纽，地铁即将直通机场，还开通了机场到周边地区的大巴；属经济发达地区，金融业与会展业同样发达，也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周边地区旅游资源丰富，等等。法兰克福空港的崛起、跨越式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、借鉴。其中一大思路是着眼于“中转客流”，做好“外引内转”。“外引”是创设各种优惠条件，千方百计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及航班，提升客流量；“内转”是加密宁波至海内外航班，吸引国内外“中转客流”，增加转机客流量，努力成为“中转枢纽港”。

市委书记刘奇曾评价航空产业“带动性强，附加值高，航空市场的前景十分广阔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产业，宁波应该在发展航空产业方面占有一席之地”，具有前瞻性。去年在庆祝宁波民航通航30周年之际，宁波空港交出了成绩单：截至去年10月底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536.1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6.6%，年客流量即将突破600万人次。在甬运营的国内外航空公司达到33家（2014年11月17日《宁波日报》），成绩令人振奋。这也说明，宁波空港有能力“更上一层楼”，热切希望它在国际化进程中能尽快“冲天起飞”，“大鹏”展翅。